

理论前沿

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中的教育主权与文化安全*

殷小平

摘要: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 随着高等教育国际交流的日益增多, 我国的教育主权和国家文化安全面临着潜在的挑战。历史和比较研究告诉我们, 面对问题, 我们应该保持一种审慎的质疑态度而非盲目乐观的态度, 要警惕外国在与中国开展高等教育交流的背后存在着经济利益和政治文化用心, 防止国家主权的旁落、让渡、转移, 要采取平视对话和差异互动的文化交流模式, 坚持文化自觉和学术自立, 确保国家文化安全。

关键词: 高等教育国际化; 教育主权; 国家文化安全

中图分类号: G649.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10(2005)06-0001-05

On the Educational Sovereignty and National Cultural Security during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of Higher Education

Yin Xiaoping

Abstract: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of higher education dramatically increase, which will potentially threaten our educational sovereignty and nation's cultural security. By the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study, we can find that facing the challenges, we should not take a blind optimistic attitude but a critical one, and be on guard against the economical,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ntentions of foreign countries, and make sure that our educational sovereignty not be trespassed and succeeded by others. For the sake of our nation's cultural security, we should take a model of equal dialogue, and insist on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academic independence.

Key words: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educational sovereignty; national cultural security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 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 世界范围内兴起了新一轮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浪潮。在这种浪潮的推动下, 我国高校与国外高校之间的国际交流呈现出空前的强劲势头, 交流项目之多、范围之广, 属前所未有的, 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果。然而, 在喜看高等教育国际交流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 我们也要冷静地看到这种“‘交流’是盘根错节的思想文化问题, 它把时代的种种自我冲突编进了自己的代码之中”,^[1]要警惕外国在与中国开展高等教育交流的背后潜存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文化用心。因此, 在积极推进高等教育国际交流的进程中, 我们时刻不能忽视教育主权与国家文化安全问题。

因为, 维护我国的教育主导权, 确保我国教育主权的旁落、不让渡、不转移、不受侵犯与干预是我国开展高等教育国际交流应坚持的基本原则, 也就是说开展高等教育国际交流要坚持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相互尊重, 以不违反我国法律, 不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为前提。鉴于教育主权的重要意义, 围绕“能否维护教育主权”和“如何维护教育主权”的话题已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其中, 不少学者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他们认为, “在当今国际教育交流合作和教育贸易中, 只要把境外教育纳入到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的管辖之下, 我国的教育主权是不会旁落的”,^[2]“上个世纪20年代中国能够依靠民众的力量收回部分教

* 收稿日期: 2005-06-28

作者简介: 殷小平(1977-), 男, 湖北黄冈人,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 主要研究领域: 高等教育学。厦门, 361005。

育主权,那么,80年后的今天的中国,作为一个正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的主权国家,完全有能力保障教育主权不受任何侵犯。有人担心随着教育服务的开放,国家的教育主权将要受到挑战。其实国外教育机构来我国办学必须要遵守我国的法律、法规,接受我国政府的管理,它不可能对我国教育主权构成威胁。”^[3]还有学者认为,即便是外国独资大学,只要有《宪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国际法》、《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和中国政府签订的WTO教育服务贸易承诺“减让表”作制约,即使授予它一定的大学“自治权”,也不会因此使学生受到“侵蚀”或“演变”,更不会侵犯国家教育权和教育主权^[4]。概言之,他们认为,因为中国有独立的国家主权,所以只要中国在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中依法管理、依法行政、依法监督,就能保证教育主权的不受侵犯;因此,对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中教育主权问题的担心是多余的和不必要的。对以上学者的乐观论断,笔者心存疑虑,不能“照单全收”,有必要从以下两个视角来展开辨析和商榷。

一、国家主权和教育主权的视角

以上学者的乐观论断可能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前提,即在全球化时代,不仅教育主权可能会受到威胁,就连一些民族国家的主权都会不同程度的弱化。全球经济创造出了一个不再是以国家政策主导经济力量的世界,而是一个由超越国家的地缘经济力量主导经济政策的世界。全球化的本性不仅具有潜在的排斥性,存在着剥夺处于全球化进程中的弱势地位的各种参与者的发言权的危险,而且似乎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掩盖着全球化进程中的权力关系、等级差别以及矛盾冲突。冷眼观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某些发达国家所倡导的“全球化”意识形态,确实有借用全球“共同繁荣”、“全球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旗号,推行其“经济霸权”、“文化霸权”乃至“军事霸权”的嫌疑,在一定程度上“全球化”浪潮已经弱化了发展中国家的主权。例如,大家熟知的“人道主义干预”就是人权高于主权理论的必然结果,“先发制人战略”就是无视国家主权的新帝国主义理论的自然延伸,“全球治理战略”就是世界主义理论的逻辑要求。另外,国际体制之所以使世界秩序得到稳定是由于霸权国家提供了体制这一国际公共物品,维护了秩序,并通过这一认识得出了新的结论。在落后国家

加入这一体系时,所拥有的获得双赢博弈的余地是十分有限的。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同样也存在着这种潜在的危机。

具体来看,随着中国加入WTO,国外各种高等教育机构纷纷“抢滩登陆”中国的高等教育市场,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冲击。外国教育机构来华合作办学等高等教育国际交流项目的主要目的是来“淘金”,而非“教育扶贫”;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把目光投向中国留学生,成为“人才收割机”,既“收”人,又“割”钱。据介绍,美国一年就接受中国留学生5万人,这相当于中国20多所著名大学一年毕业生的总和。“有糖的地方就有蚂蚁。”这种经济利益是显见的,这是教育作为一种服务贸易的内在要求,是容易按照法律、法规来约束的,尽管这些法律法规都是西方发达国家按照“利己”的原则制定的“游戏规则”。然而“教育可以被看作是‘外交政策的第四个层面’,“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5]“传教士已成为世界上的一股势力。政治家已确信,传教士是一种媒介,通过他们,西方的意志必定要对中国起作用”,这种交流背后的政治和宗教方面的用心则是潜在的,是“于无声处”、“随风潜入夜”,是不容易按照法律法规来约束的,也是很难判断的。说到这里,有学者或许会说,高等教育国际化交流中也有不少是非敌意的交流与合作,甚至不少是和善的援助。对此,笔者不是急着要去否认这种可能,只是觉得不能单纯地、不加分析地看待它,因为它从来就不是单纯的。不妨让我们仔细听听来自美国的国际著名比较教育学家菲利普·C·阿特巴赫给我们的告诫:“工业化国家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专门知识,部分原因是为了维持它们对第三世界大学的影响,部分原因是出于利他的动机,可能还有部分原因是出于他们的知识优越感”,“给第三世界的国外资助项目、技术援助及其他方面的援助有复杂的动机以及通常不可预料的各种后果。捐赠国在提供资助时往往怀有好几种目的,其中之一便是教育和政治结构的渗透,这种渗透能确保稳定及普遍地模仿西方的趋向”,“这种援助维持了第三世界的依附模式”。^[6]回到国家主权和教育主权这个问题上来,尽管笔者承认中国作为一个有着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其国家教育主权旁落的可能性是甚小的,但却并非绝不可能,也更不能由此断定教育主权不会被部分让渡、转移和干预。因此,在全球化时代,对

待这个问题, 我们应该保持一种审慎而非盲目乐观的态度。

二、教育主权和国家文化安全的视角

与上面提到的经济、政治、宗教因素相比, 我们更容易忽视的是教育主权中的文化因素, 即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国家文化安全指一个主权国家的文化价值体系, 特别是主流文化价值体系, 免遭来自内部或外部文化因素的侵蚀、破坏或颠覆。国家文化安全是整个国家安全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确保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我们关注文化安全, 也就意味着我们已经注意到来自文化领域里的不安全因素的困扰、侵蚀乃至威胁。当维系国家、民族生存发展的价值观念或主流意识形态受到来自内部或外部的副作用而发生扭曲、变形时, 当国家的文化立法权、文化管理权、文化制度、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的独立自主权等等受到干涉或限制难以正常发挥作用时, 国家文化安全乃至整体的国家安全就只能是一种期望了。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 在温情脉脉的文化交流和整合的背后, 价值冲突以血与火的形式上演着, 全球化与价值冲突的关联日趋明显。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价值领域的冲突异常激烈, 表现形式也异彩纷呈。政治、经济、文化的冲突, 其核心是价值冲突。自由主义、新干涉主义甚至以武装冲突的形式肆无忌惮地表达西方的价值理念。东方主义与亚洲价值观的式微使传统价值观前景堪忧, 也直接影响到其民族利益的表达。在全球化时代, 价值的困境, 是一个民族前进方向的迷失。为什么这样说呢? 打一个不一定恰当的比喻, 如果我们将国家比喻成一个有机体, 那么军事是其骨骼, 政治是其头脑, 经济是其血肉, 文化就是其遍布于全身的神经系统。神经系统的“中毒”或“紊乱”会使国家这个巨人无论拥有多么坚强的骨骼、多么智慧的大脑、多么丰满的血肉也不能挺立于世。这也就是说, 一个民族国家失去了文化特性, 民族独立性也就失去了依托。拿“苏联解体”这个活生生的例子可能更好说明这个问题。中国社科院陈奎元院长曾深刻指出: “苏共丧权、苏联解体, 当然有体制僵化、经济缺少活力、决策失误等多方面的原因, 但精神信仰的崩溃, 在‘西化’、资产阶级自由化的

冲击下, 党和人民的思想陷于混乱, 则是更为深刻的根源。”^[7]那么中国的情况又如何呢? 20世纪90年代初, 美国一本专门从事中国研究的杂志说: “在中国面临的各种危机中, 核心的危机是自性危机 (Identity Crisis)”, “中国正在失去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中国性。”^[8]回顾历史, 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 举凡那些破坏或企图破坏其他主权国家安全的侵略者, 总是在进行军事威胁与占领、政治遏制与颠覆、经济剥削与掠夺的同时, 进行有预谋的文化侵略, 丑化、解构甚至从根本上摧毁主权国家的主流文化价值体系, 从而达到危及和侵犯主权国家的文化安全和国家安全的目的。针对这个问题, 爱国诗人闻一多先生早在1925年就曾振聋发聩地指出: “我国前途之危险不独在政治、经济有被人征服之虑, 且有文化被人征服之虑。文化之征服甚于其他方面的征服千百倍之。防微杜渐之责, 舍我辈其谁堪任之!” 闻一多先生的这句提醒对今天来讲仍然不乏警示作用。因为, 当前随着我国加入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与国外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 教育国际化至少在现阶段具有促使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国家成为已发达国家的文化和教育附庸的危险, 国家文化安全面临着严峻挑战。

此言绝非危言耸听。近代以来还存在着“中心—边缘”结构为特征的民族国家体系, 而且中心与边缘不仅仅存在于国与国之间, 同样也存在于工业化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学之间。正像菲利普·C·阿特巴赫所言, 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型大学是知识和教育的创造者, 处在国际知识和教育体系的“中心”地位, 第三世界的大学则是知识的传播者和教育的模仿者, 处在“边缘”的地位。^[9]这位美国学者还一针见血地指出, “第三世界的大学是殖民机构”, 因为“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建立在某种西方模式上, 反映着西方体制下的多种价值观念和形式。在许多情况下, 教学语言用的是外语, 很多教师曾在海外受训”。更深刻的在于, 这种情况已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 而且已经变成一种制度安排。就其现实发展过程的内在文化逻辑而论, 教育全球化的后殖民特征日趋明显, 发达国家借助其先进的科技、拥有众多的文化输出渠道, 再加上其领先的政治经济地位, 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新的文化殖民主义。其社会价值观、思维和行为模式、生活方式甚至包括政治观点等方面都会随着知识技术的输出而传播到发展中国家。这样, 在教育全球化过程中, 我们看到的是第三世界国家

教育的更加西化、非西方的文化传统从主流教育中的迅速消失、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才流失和西方文化主导下的世界趋同等现实的后殖民过程。可以说,在文化思想上的这种不加选择地全盘西化,实际上是进入了一个很大的误区。这种误区是以“赶超”的高压迫使得中国长期处在以他者为标准和尺度的自卑又自傲的狂躁情结中,自觉不自觉地以西方人的眼光和标准来审视自己的一切作为,甚至为了西方的喝彩而做秀——割裂中国传统,消解传统中国精神,放弃中国立场,丧失中国身份。按照这种虚矫模式加以推论,即使在文化上做到不比洋人差,甚至比洋人玩得更好时,却已将中国文化的“太极剑”玩成了西式的“拳击”——邯郸学步、南辕北辙而已。

“观今宜鉴古”,以上提到的这种种种情形在我国历史上依稀可见。北京大学的学生罗章龙在回忆上个世纪20年代在北大的经历时写道:“留学教员中,从美国回来的,有亲美派。他们推崇美国的‘民主制度’,大力奉倡杜威的实证哲学。而从英国留学归来的,则歌颂英国的‘议会制度’,羡慕英国的生活。甚至有人公开说:‘假如中国有一天亡国了,我希望亡在英国人手里’。”^[10]几乎与此同时,北大的教员沈尹默提到当年的预科学长徐敬侯“一开口说是‘我们西国’如何如何”。^[11]北大教授陈百年在1923年也曾注意到:“今日的思想以为‘凡是新的就是好的’”,同时“现在的人以为外国来的都是新的,所以‘新的就是好的’的思想,一变就成了‘凡是外国的都是好的’。”趋新大势与尊西倾向的结合是非常明显的。对此,蔡元培曾敏锐地指出:“吾国学生游学他国者,不患其科学程度不如人,患其模仿太过而消亡其特性。所谓特性,即地理、历史、家庭、社会之影响于人之性质是也。学者言进化最高级为各具我性……能保我性,则所得于外国之思想、言论、学术,吸收而消化之,尽为‘我’之一部,而不为其所同化……尽吸收其优点,且发达我特性也。”^[12]否则,只能造成“留德者为国内增加几辈德人,留法者、留英者,为国内增加几辈英人、法人”的结果。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再看看我们的东邻日本,也不无镜鉴意义。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采取所谓“脱亚入欧”的政策,其结果是教育被西方模式所同化。日本学者井深大指出:“日本近代教育是以‘赶超欧美’为出发点的,因此,其教育内容也全部吸收了欧美的教育内容,开始时连教科书等

也是翻译欧美学校使用的教科书来使用。令人吃惊的是,甚至连国语课本也是翻译美国的威尔逊读本,在全国各学校使用。”^[13]另一位日本学者池田大作也说: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由于热衷于向欧美各国学习,“特别是有这样一种倾向,一提到知识分子,不是根据一个人有多少智慧,而是看他懂多少欧美思想和学说来判定。”^[14]这样的教育模式除了能够培养出一大批“香蕉人”,还能有别的可能吗?从日本近代以来教育的命运中,我们分明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还美其名曰“与国际接轨”,这是近两个世纪以来东方民族陷入的一个误区,其结果只能是民族自信心丧失殆尽,以至于出现一种极度的反弹。1970年11月25日,日本文学大师三岛由纪夫以日本传统的自杀方式结束了自己45岁的生命。他在死前发表的演说中指出:“我们看到,战后的日本受经济繁荣所陶醉,忘记了国家的基础,丧失了国民精神,舍本求末,陷入敷衍和伪善,自动地跳进了灵魂空虚的深渊。”^[15]他的绝望在于日本文化传统在现代性的挤兑中逐步消逝。由此可见,文化上的原因乃是三岛由纪夫之死最深刻的原因。它归根到底源自一种难以排解的文化焦虑。三岛由纪夫的自杀,无疑是一个具有浓厚象征意味的事件。类似的文化焦虑在中国学者那里也有深切的体验。例如,对中国文化有一种生命般关怀和担当的钱穆先生,以其特有的对中国文化命运的敏感和忧患,“看到一旦传统被抛弃,新的中国就会产生一大批(西方式的)技术人才,同时中国也就把灵魂卖给了西方。”^[16]

综上观之,在为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浪潮欢欣鼓舞之余,我们也不得不以批判的睿智审视其普世主义乌托邦理念下面涌动的“后殖民主义”的暗流,警惕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中教育主权的显性和隐性的旁落、让渡和转移。笔者之所以着重于此予以强调,并非意在否定对外来文化采取开放的态度,也决非狭隘的民族主义情节作祟,更不是极度自卑心理引发的自大狂式心态使然,问题仅仅在于文化开放只有建立在一种文化自觉和平等对话关系的基础上才可能是建设性的。基于对中西文化关系的主体态度和文化意向,我们应该坚持的是“平视对话和差异互动模式”,^[17]求平和求生态求多元是其基本特征。平视对话就是坚持继续拿来,但又不满足于仅仅拿来,而是要超越拿来思考拿来之后的事情;抵制要么媚俗迎合要么狭隘民族主义地排斥西方的思维模式,而是继续学习西方之长处却又

不仰视迷信西方,当然也不自我迷恋,只是将本土话语与人类共性共识相结合,用中国当代的全球性眼光而非西方人的眼光“重新”发现和阐释中国,精心打造“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品牌,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形象。那种自我保守僵化或者自我虚无的殖民心态都已过时,需要的只能是开窗(拿来)和开门(输出),才能使那种所谓的“聋子对话”的时代成为过去。应该以不卑不亢的胸怀,不屈不挠的志趣和不偏不倚的气度,走出一条充分体现“沟通理性”的既利己又利人的康庄大道来,纠正我们在西方人视野中的“妖魔化形象”。值得指出的是,“文化输出”不是强势地位征服别人,而是一种对等交流和对话重新确立,是在几个世纪以来不断边缘化的中国文化自己发言的机会,寻求中国形象和中国文化身份的重新阐释和重新确立,进而在中国知识界重新发现和创造中国文化的魅力中实行“文化输出”战略,进而打破全球化的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单边主义,在新世纪世界文化中发出中国的声音,展示出新世纪中国文化的精神魄力。只有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国家文化安全,才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是开放的,而不是关闭的;是发展的,而不是停滞的;是维护文化多样性的,而不是推行文化单一性的。□

参考文献

- [1] [美] John Durham Peters. 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 [M]. 何道宽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3: 2.
- [2] 陈鹏. 加入 WTO 对我国教育主权的影响 [J]. 中国教育学刊, 2003, (4): 14.

- [3] 潘懋元, 胡赤弟. 民办高校产权制度改革的若干问题 [J]. 教育研究, 2002, (1): 28.
- [4] 韩延明. 大学理念论纲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4: 299.
- [5] 清华校史编写组. 清华大学校史稿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3.
- [6] [9] [美] 菲利普. G. 阿特巴赫. 比较高等教育: 知识、大学与发展 [M]. 人民教育出版社教育室译,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 31~36, 28~29.
- [7] 陈奎元. 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 [N]. 人民日报, 2004-04-20.
- [8] 陈定家. 全球化与身份危机 [M].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3: 15~16.
- [10] 罗章龙. 椿园载记 [M]. 北京: 三联书店, 1984: 23.
- [11] 陈平原, 夏晓虹. 北大旧事 [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8: 167~168.
- [12] 蔡元培. 蔡元培全集 (第三卷)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28.
- [13] [日] 井深大. 精神. 道德. 情操——无视另一半的日本人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7: 39.
- [14] [英] 汤因比, [日] 池田大作. 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 [M].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5: 79.
- [15] 唐月梅. 怪异鬼才——三岛由纪夫传 [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4: 310.
- [16] [美] 邓尔麟. 钱穆与七房桥世界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5: 40.
- [17] 王岳川. 发现东方 [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3: 35.

(责任编辑 徐东)